本版编辑：龚 克
E-mail：z4@studytimes.cn
Tel：010-62806124

不忘初心，方能打破“历史周期率”——

“历史周期率”与“延安窑洞对话”

□ 薛鑫良

1945年7月4日，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，与黄炎培（时任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员等职）进行了关于“历史周期率”的谈话，成为党史国史上著名的“延安窑洞对话”。

2012年12月24日和2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明确指出，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；并强调“物必先腐，而后虫生”。

据《左传》记载：春秋时期，鲁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683年）秋天，宋国遭遇了洪水灾害。鲁庄公派遣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。宋湣公对鲁国使者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对上天不诚不敬，上天才降下了灾难。让贵国君王也连累担忧了，真是感激不尽！”鲁国官员臧文仲听到宋湣公的这些话以后，感慨地说：“宋其兴乎！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

本来，夏、商两个王朝的兴亡，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君王“罪己”或者“罪人”这一个原因；然而，君王“罪己”或者“罪人”，无疑是朝代兴亡的重要因素。这就是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“历史周期率”和“罪己者兴，罪人者亡”的“兴亡因果律”。

深谋远虑的对话

1945年7月1日，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陕北延安；乘客中有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。时年67岁的黄炎培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撰写的《西行漫记》《毛泽东自传》等书籍。俩人心仪已久，这次在延安可谓一见如故。

黄炎培等人在延安的“破冰之旅”访问了五天，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三次共十多个小时的会谈。双方形成了《延安会谈记录》，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“从速召开政治会议”等内容。

7月4日下午，毛泽东与黄炎培彼此推心置腹，肝胆相照，畅所欲言，谈古论今。

黄炎培熟谙历史，又有丰富阅历。他在延安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。同时，黄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团疑虑——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可怕的周期率，一种使人堕落、使物变质、使时间逆转的无形的支配力。他坦诚地说：我生六十多年，耳闻的不说，所亲眼看到的，真所谓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。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政党、一地方乃至一国，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。大凡初起之时，都是艰难困苦，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，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，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、气象一新。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，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。有的因为历时长久，自然地惰性发作，由少数演变为多数，到风气养成，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，并且无法补救。一部历史，或政怠宦成，或人亡政息，或求荣取辱，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。……国民党初起时，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！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？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，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。

黄炎培的一番话，使毛泽东颇有“心潮逐浪高”的感受。他坦然回答说：正所谓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“富贵不佐三代”，也包含了先生你讲的这些道理。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，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

黄炎培听罢，点头表示赞同。当时，国民党统治者把共产党宣传为“一群青面獠牙、十恶不赦的人”。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，这次到延安看到的却是“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景象：“一没有贪官污吏，二没有土豪劣绅，三没有赌博，四没有娼妓，五没有叫化子，六没有小老婆，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，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，九没有人吃磨擦饭，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”。这“十个没有”的清正气象，与他们在重庆等地看到的国民党统治者“一句真话不讲，两面做人不羞，三民主义不顾，四处开会不绝，五院兼职不少，六法全书不问，七情感应不灵，八圈麻将不够，九流三教不拒，十目所视不怕”的腐败现象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。

1945年8月10日，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《延安归来》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，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。”“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，倒是不断地要好，不断地追求进步。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，前途希望是无限的。”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，以免遭受人身危险。他说：“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，决不加以渲染。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。”

民主政治的硕果

毛泽东为什么说“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”呢？这就要从延安时期（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）毛泽东闻骂“罪己”、党中央知错即改、共产党“其兴也勃焉”的史实说起。1941年夏天，毛泽东先后两次受到了农民“恶毒的咒骂”。当时，天空响雷，地上触电，两次劈死了两个人。第一次，一个农民骂“老天爷不开眼，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”；第二次，农妇伍兰花骂“世道不好，共产党黑暗，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”。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两个“反革命”，并把伍兰花从清涧县拘押到延安城，建议判处死刑，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以后就枪毙，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。

毛泽东闻讯以后，两次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，并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念。他说：群众发牢骚、讲怪话，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，讲了几句尖锐一点的难听话，就去追查，就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，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，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。党群关系就像鱼水关系。

毛泽东还把伍兰花请到自己的住处，面对面地了解到“咒骂”的原因：一是农民负担太重；二是干部作风败坏；三是伍兰花丈夫触电身亡，家里还有七十岁的瘫痪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因此，又悲又愤有怨气。毛泽东嘱咐保卫部门负责人：马上派专人把伍兰花护送回家，还要带上公文，向当地政府讲清楚，她没有什么罪过，而是敢提意见的好人，并按困难户给予照顾。

伍兰花回村以后，“先抓，后放”的消息不翼而飞，传遍各地。乡亲们说：古人讲，宰相肚里撑大船，毛主席、共产党太厉害啦！得民心者得天下啊！

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自省，举一反三；并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调查，发现“确实公粮（农业税）太多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”。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，由1937年1万石（1石约300斤），增加至1941年20万石。其重要原因，就是机构膨胀，出现了“食之者众，生之者寡”的严重矛盾，1941年的脱产人员总数，竟相当于1937年9月的5倍。

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，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民主，汲取民意，保障民权，改善民生，节制民劳，争取民心。例如，实行精兵简政；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；创建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权；切实减轻人民负担；坚决防治干部腐败（制定和实施《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》等法规。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，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，全身负伤90多处，但蜕化变质，贪污3050元。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“功不抵罪、罪不否功”的原则，于1941年12月底依法对肖执行死刑）……在党的“七大”期间，毛泽东又先后四次作自我批评，检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；并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：“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。”

“水可载舟，水可覆舟。”到1948年3月23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、进入华北的时候，党员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至约290万人，人民军队约240万人，根据地民兵约300万人。

居安思危的考问

星移斗转，人间沧桑。七十多年过去了，两位政治家的“延安窑洞对话”言犹在耳、振聋发聩。“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”的考问，留给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诸多的思考和警示。昭示我们。必须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，大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：“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天经地义。”“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，这是一条铁律。”全面深化改革，“自己改自己，刀子很难切下去。”“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。对中国共产党而言，要容得下尖锐批评，做到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”

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常怀忧党之心、恪尽兴党之责；既要防止“棒杀”，更要防止“捧杀”。构建良好政治新生态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不“为人民币服务”；不折不扣地向人民负责，不“唯上、唯书”；真心实意地让人民作主，不搞“衙门作风”；自觉自愿地受人民监督，不搞特殊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跳出“历史周期率”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

（作者系中央党校机关党委原副书记）

文史天地

史来贺的初心

□ 徐 雷

如果用繁星来比喻“新乡先进群体”的话，那么史来贺无疑是这繁星中最为璀璨的那一颗。2013年8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史来贺的先进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作出重要批示：“史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很感人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，可集中宣传一批各类党员干部正面典型人物，使大家学有榜样，行有示范。”

最早关于史来贺的记忆，还是儿童时代，父亲告诉我以后一定要去史来贺带领下的刘庄看看。从此，史来贺便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二十年后，当初的懵懂少年已成长为一名博士生，并有幸于2016年6月赴新乡参加党性锻炼。

君在我尚小，我来君已老。斯人仙逝，哀兮伤兮，只能借助他在刘庄的点点滴滴来感受他的那些年。

让人民过上好日子

史来贺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生活，是共产党把他和刘庄人解放了出来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因此，史来贺及刘庄人始终对党心怀感激、忠诚与热爱，对党的事业信念坚定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，就是史来贺的初心。

史来贺说，“信仰信念是个大问题，信仰信念搞不清楚，就像人走路没有目标和方向”，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刘庄翻天覆地的变化”，“共产党是为了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，共产党就是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”，“听党的话，永远跟党走，挖掉穷根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”。

51年里，不管形势如何变化，不管道路如何曲折，史来贺始终秉持入党时的宣誓，“为了穷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，……不怕死，不怕吃苦，不怕吃亏，跟党走，一辈子不变心，死不回头！”

白天种棉粮，晚上盖楼房

1976年，刘庄开始建设第一代住房，由于当时还面临大量的农业生产工作，史来贺就带领着干部群众“白天种棉粮，晚上盖楼房”。然而，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使史来贺的心脏病发作了，医生劝他说：“你得住院，要不然会出人命的！”史来贺没理会，第二天照样干，结果一头栽倒在工地上。村里干部群众急得直跺脚，忙送去医院抢救。等史来贺睁开眼，第一句话就批评大家：“你们不去盖房，待在这里干啥！”大伙急了：“你再不住院看病，俺都不干了！”史来贺坦然一笑：“这点小毛病算个啥，想把我这一百斤撂倒，没恁容易！”

以往史来贺外出开会、学习，总会和村里干部群众打个招呼，然而，2003年春节过后，史来贺去北京看病，怕影响村里工作，没让村里干部群众知道。过了几天，村里干部群众得知了史来贺是去北京看病了，心急火燎，争着抢着要去看史来贺，最终委托两名村干部前往。他们到了北京，见到史来贺，史来贺却让他们抓紧回村，并交代：“不要让其他人再来看我，只要你们把家里的工作干好了，我在这里看病也放心。”然而，让刘庄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，在这次会面后的41天，史来贺就永远地离开了。

刘庄人心中的乡贤

刘庄的第三代住房建好了，而史来贺却再也没有搬进去，这也成了刘庄人心中永远的遗憾。刘庄人不会忘记：节日到了，史来贺和党员干部把肉、油、面、菜和糕点送到群众家里；冬天到了，他组织党员干部把煤送到各家各户；村民病了，他都要亲自去看望；每年除夕，他都要和党员干部到饲养室值班，把饲养员替换下来，让饲养员回去和家人团聚。

51年里，在刘庄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要找史来贺合计合计；谁家夫妻、兄弟、妯娌生气闹别扭，要找史来贺调解调解；所以，当史来贺出门开会，刘庄的老大娘、老大爷会自发聚集村头，翘首望着村北大路，盼着史来贺早点回来。

超越于时代的创客

曾有记者问史来贺：“你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是什么？”史来贺笑着说：“我平生有三件痛快事：一是下着大雨，光着脊梁淋着雨在地里干活最痛快；二是为刘庄、为集体干成一件事最痛快；三是看到刘庄富了，全国的农民都富起来了，我心里最痛快。”

史来贺说，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让广大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。所以，千变万变，发展经济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”，“当干部就得‘干’字当头，真心实意给群众造福”，“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，如果群众过不上好日子，那就是咱共产党人没本事”。

51年里，史来贺既认真贯彻党在不同时期的农村政策，又敢大胆创新。比如，50、60年代，他带领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，实现了粮棉双高产，解决了全村人的温饱问题。70年代，他带领群众探索发展工副业，在村里兴办奶牛场、机械加工厂、造纸厂、淀粉厂等集体企业，使刘庄在全国大多数农民还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年代里，早早过上了小康生活。80年代，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村“大包干”浪潮，史来贺从刘庄集体经济基础好、村民生活水平高等实际情况出发，整合资源，走出了一条更高层次的“综合经营、专业生产、分级管理、奖惩联产”的改革新路子，创造了独具刘庄特色的“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”。90年代，他带领群众建起了生物制药厂，从德国、日本等国引进先进仪器和设备，用高新技术推动刘庄经济发展。进入新世纪，在史来贺的带领下，刘庄又往农民知识化、生活城市化、管理民主化方向发展。

清名铸就点滴间

史来贺说，“共产党员的称号就是奉献，不是索取。当干部不仅要带头苦干，还要过好名利关”，“如果自己吃点亏，让群众都富了，那么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”。史来贺临终时，对家人说：“我当了一辈子干部，挖地三尺，也不会挖出我收取过群众一分钱的好处”。

他在当村干部期间，一直拿群众的平均工分，上级规定给他的补贴工分，他一个也不要。1956年，他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，当群众平均收入比他低的时候，他把工资交给集体，只拿群众收入的平均数；当群众的收入超过他的工资时，他又仅拿自己的工资，不要村上的补贴。

51年里，史来贺始终严格要求家人、党员干部。史来贺给自己的家人立规矩：不准搞特殊化，不准沾集体的便宜，不准收礼送礼。史来贺给党员干部立规矩：不准搞特殊化，不准谋私利，不准脱离群众；以权谋私的免职，搞派性、闹不团结的免职，弄虚作假、争名誉闹地位的免职，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免职，工作敷衍了事的免职。

我们来看看史来贺的资产：一根铁丝上挂满了他和老伴的四季衣物，一张破旧的木床上摆满了他读过的书，他生前给刘庄留下了9亿多的资产，自己却连一个普通的衣柜、书架都没有。

2003年4月，史来贺去世的噩耗传到刘庄，全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4月30日上午，刘庄道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白花，全村老少都出来送别老书记。原计划400人的遗体告别仪式，最后来了6000多人。老书记的灵车缓缓行进，村民们痛哭流涕，泣不成声：“老书记，好人啊……”

信仰是看得见的，史来贺的一生，写满了共产党人的信仰；史来贺身上的精神，凝结着共产党人的血脉；史来贺释放的力量，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坚定如磐。

（作者系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）

学员作品

诗 歌

七绝 长七飞天

□ 李德忠

海天椰林箭在弦，
数载磨剑终问天。
风弛电掣贺天举，
力拔山兮凯歌还。

注：6月25日，长征七号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成功。

（作者系辽宁省本溪市委党校副校长）



蔡亮宏 画

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

□ 李 宁

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一个理论，即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，无论发表什么言论，无论做什么事，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，这就是“塔西佗陷阱”。它的形成，主要原因在于，一些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为了一己私利，或乌纱，或名声，或政绩，有意掩盖了事实真相。而政府部门发言人所发布信息的内容、尺度，往往取决于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授权，当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打算发布事情真相时，实际上，留给发言人的回旋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。因此，一旦有媒体问到敏感问题，或公众要求回答敏感问题时，发言人要么回避，顾左右而言它；要么说假话，敷衍公众；要么干脆就不说话。公众从这些闪烁其词的态度中，读出了怀疑，久而久之，就产生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感，逐渐形成了“塔西佗陷阱”。

2014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，曾就这个问题郑重指出：“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，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”。

那么，如何跨过“塔西佗陷阱”呢？

首先，要加强信息发布的职业培训。通过培训，使各级政府负责人和发言人认识到，政府部门的信息发布不是随心所欲的，是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真相为基础的。我们党历来讲究实事求是，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，无论是新闻发言人，还是官方微博，都应恪守实事求是的信息发布原则，遵守职业道德，把说真话，讲实情，放在首位。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，第一时间回应人民群众的疑问，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，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，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渠道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更好地汇聚民心，凝聚力量，只要不断地坚持说真话，讲实情，用不了多久，是就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。

其次，要规范信息发布的规章制度。信息发布是政府与公众交流的重要平台。因此，有必要对信息发布程序予以规范，并加强对政府部门发言人和相关负责人的党纪国法约束，把违反信息发布制度和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，纳入到党纪国法处理的范围，提高发布不当信息的违纪违法成本，并及时将结果向全社会公布，形成威慑力，保证信息发布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权威性。当然，如果由于客观条件限制，一时已经公布但没能得出正确结论的信息，对相关负责人和发言人则不必使用党纪国法来处理，但仍需公开、及时、诚恳地向公众道歉，以此塑造政府部门诚信的形象。

另外，要加大对非官方虚假信息的惩处力度。由于新媒体全时、全域、全民、全速传播的特点，社会所有成员都有了在公共空间发言的权利，而且传播的速度很快。于是，难免有些不明真相或有意歪曲真相、混淆视听的人利用这个机会，传播、散布一些谣言。对这种现象，相关管理部门要采取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加大惩处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，采取多种措施，坚决进行打击，对一些不负责任的，为虚假信息的发布提供平台的网站、微博等，应及时予以封停，并将结果公之于众，形成震慑力，让造谣、传谣者受到惩罚，还公共空间一片净土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央党校科研部）

散 文

刊址：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：（010）62805132 邮政编码：100091 订价：全年88元 订阅：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：（010）62806227 照排：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